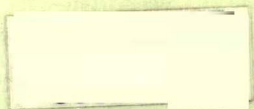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

吴剑杰 编著



武汉



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

吴剑杰 编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

吴剑杰 编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 珞珈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孝感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7.375印张 186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65

ISBN 7-307-00667-7/K·44

定价：1.80元

目 录

绪论 西学中化与中学西化

——中国近代政治思潮的文化渊源…………… (1)

第一章 鸦片战争时期的社会思潮…………… (18)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思想界…………… (18)

第二节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社会批判思想和社会改革思想…………… (24)

一、社会批判思想…………… (25)

二、社会改革思想…………… (32)

三、对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革思想的评价…………… (41)

第三节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爱国维新思想…………… (42)

一、“民心可用”、团练御侮的反侵略爱国思想…………… (43)

二、“师夷制夷”的维新先驱思想…………… (47)

第二章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 (55)

第一节 洪秀全及其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农民革命思想…………… (56)

第二节 农民平均主义及其评价…………… (63)

第三节 太平天国宗教神学思想的局限性…………… (72)

第四节 农民领袖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78)

一、太平天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前提和愿望…………… (79)

二、《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向西方学习的最高体现…………… (81)

第三章 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洋务思潮…………… (89)

第一节 洋务思想体系的形成与评价	(90)
一、洋务思想体系的形成	(91)
二、洋务思想体系的评价	(97)
第二节 洋务思想纲领——“中体西用”	(102)
一、“中体西用”的提出与发展	(102)
二、“中体西用”思想在中法战争前后的不同历史作用	(107)
第四章 戊戌时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	(118)
第一节 早期维新思想及其与洋务思想的分离	(119)
第二节 戊戌维新变法思想的理论基础	(132)
一、康有为和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133)
二、严复及其所译《天演论》	(143)
第三节 维新变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147)
一、“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	(150)
二、自上而下的“全变”思想	(153)
三、“君民共主”的民权思想	(156)
四、“以工立国”的经济思想	(159)
第五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	(165)
第一节 维新变法思潮的衰落与民主革命思潮的 兴起	(165)
第二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175)
一、民族主义思想	(177)
二、民权主义思想	(178)
三、民生主义思想	(183)
第三节 国粹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	(189)
一、关于国粹主义思想	(189)
二、关于无政府主义思想	(199)
第六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低落和马克思主义 的传入	(205)
第一节 尊孔复古主义猖獗与旧民主革命思想低落	(206)

第二节	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兴起	(212)
第三节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218)
附 录	中国近代思潮代表人物著述年表 (鸦片战争前后至五四运动)	(224)
后 记		(229)

绪论 西学中化与中学西化

——中国近代政治思潮的文化渊源

什么叫“文化”？这在当前还是一个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甚为模糊、因而尚无定说的课题。一般认为：广义上的文化是指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创造和积累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即所谓“文物教化”，它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所形成的心理与行为。有人据此将文化的整体划分为三个层面，即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和心的部分。所谓物的部分，主要是指经过人力作用过的事事物物；心物结合部分主要指思想、理论、制度等等；心的部分是指文化心理状态，如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等。上述三个层面（部分）依次由表及里，彼此关联，形成一个系统，构成“文化”的有机整体。狭义的文化概念专指精神文化或意识形态，如思想、道德、宗教、科技、艺术、文学、风俗等等，即上文所说的心的部分和心物结合的某些部分。不管是物质、精神两部分也好，还是物、心物、心三层面也好，应当说，联结这两部分或三层面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思想、理论，首先是政治思想理论。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从总的趋势看，一方面，思想理论既要由人们的物质生产方式和能力所决定，又要受人们的文化心理状态所制约；另一方面，它又给前者和后者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是不同质的文化类型的最基本、最显著的表征。因此，思想、理论既是广义或狭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演变就必须从文化渊源上才能得到

比较深刻的理解和说明。

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它在经济成分、阶级结构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兼容性和多样性，诚如鲁迅所曾经描述的那样：“中国社会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由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标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个自相矛盾”。但不管如何纷乱驳杂，从广义的文化类型上说，不外是中国传统固有的封建文化与外来的资本主义文化，即通常所说的中学与西学，以及这两种文化的撞击与结合。中国近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潮，归根结底，都渊源于这两种文化，反映着这两种文化结合的深度与广度，反映着中学西化即资本主义化和西学中化即民族化的程度。

一、中西文化冲突，人们在 比较中反思和认知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各族先民，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璀璨的古代文明，它与古希腊、罗马文明东西交相辉映，曾经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两支奇葩。中国商周时代的奴隶制文化所达到的历史高度，较之同时代的希腊罗马文化毫无逊色；秦汉以迄唐宋，当天主教教会统治欧洲，一切意识形态都成为神学科目和教会奴仆的最黑暗的中世纪时代，中国的封建文化达到了自己所能到达的繁荣的极峰。只是当14、15世纪兴起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把黑暗的欧洲推进到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时候，中国才从封建之巅缓慢地向下滑行，整整落后先进的欧洲一个历史时代。资本主义

的发展要求不断为自身开辟市场。到19世纪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将触角伸向中国的时候，它遇到的是一个古老而貌似完固的封建大帝国。中西冲突不可避免，这种冲突“从广义上是一种文化冲突”^①，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文明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也就是上升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同没落的中国封建文化之间的对抗和冲突。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就是封闭的、保守的、落后的所谓“黄土文化”。这种认识和评价不能认为是历史主义的、全面的。诚然，相对于后起的、建立在世界性机器大生产和国际贸易基础之上的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即所谓“海洋文化”而言，中国古代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传统文化无疑是比较封闭保守的，但这是从时间和地域上作双向（纵、横）比较。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的、中世纪的欧洲文化似乎也很难说不封闭、不保守。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作纵向考察，它也曾有过并不那么封闭保守的时代。汉唐时期，中国与外界的文化交往曾达到相当的规模，对东亚、中亚以至欧洲文化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也吸收和融合了多种外来文化，如佛教文化等等，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内容。即使到了明末清初，这种正常的中外文化交往也不曾完全中止。其所以能做到如此，取决于如下两个前提：一是中国王朝本身的国势强盛和文化的先进与繁荣；二是外来文化不仅不足以构成对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威胁，而且往往被吸收和改造利用。但是到了近代，这两个前提都不复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才因其国势落后而日趋封闭保守，又因为封闭保守而愈趋落后。

中西文化的直接接触早在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就发生了。那时，西方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先后带来了资本主义早期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钟表、玻璃器皿、太阳历、地球图、铸炮术、日心说及天主教等等。但中西文化间不

①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77页。

曾发生尖锐冲突。清朝皇帝的一纸诏令便可以驱逐传教士，毁弃天主堂，而刚刚起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那个庞大的清帝国莫可奈何。清朝当时是强盛的，自信的。直到1840年西方强国英吉利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中西文化冲突才成为事实，并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逐渐深入而愈演愈烈。但是，一向以“神明华胄”自居的中国人对这种冲突长期不理解，对行为并不文明的外来入侵者的文化的先进性和自诩为“文明古国”的文化的落后性没有认识。阻碍着这种理解与认识的，从主观方面说，一个是顽固与僵化，一个是无知与自大。说中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需借西洋钟表以定时序；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无需借外国以通有无，等等，这类顽固与僵化的实例不胜枚举。说西学源于中学，“西学皆中土所已有”，如西方数学源于《易》，机器学源于班、墨，化学源于炼丹术，五洲说源于邹衍^①等；说“中国之大，何患无才，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这类无知与自大的实例也是不胜枚举。但实践是最权威的老师，中国传统文化抵挡不住西方文明进攻的事实，迫使中国的志士仁人开始正视现实，睁眼看世界，并在比较中鉴别和认知西方文化的长处和反思传统文化的短处，从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和途径。

这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早在60多年前，梁启超就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描述过一个过程的发展轨迹。他说：“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

① 邹衍，战国时思想家，据说他著《说海》一篇，说天下有八十一州，每九州为一集合单位，称九大洲，四周皆环海，中国只是九州中的一个洲，即赤县神州。

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当今有的学者受此启发，提出了文化三层面说，并据以将上述认识的渐进深化过程区分为三个时期，即（一）对物的部分的比较与认识（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是从物器上承认自己不如西洋文明而觉得有必要于此舍己从人的时期；（二）对物心结合部分的比较与认识（甲午战争经戊戌维新至辛亥革命时期），是从制度上承认自己不如西洋文明，而勇于维新、勇于革命的时期；（三）对心的部分的比较与认识（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时期），是新旧思想最后较量、中西文化全面比较而从文化根本上认真进行反思的时期。这些概括大体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认知的轨迹。

二、认知轨迹与时代思潮

思潮是时代的脉搏和兴奋点。梁启超对“时代思潮”有过如下的界说：“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寢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时代之要求者也。”^①这段话给我们以启示，说明时代思潮的产生和形成离不开客观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主观意识对客观环境的感召与认知，也说明能成其为潮流的思想不仅在于人们的“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而且在于这种思想必须具有适合时代要求的进步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性。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剧烈震荡和急骤变化的社会，反映这种震荡和变化的思想与思想潮流层出不穷，但都离不开对中西文化冲突的认知过程。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出了近代中国人对中西文化比较、认识的轨迹，下面，我们循此轨迹，简要勾勒近代中国人怎样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不断加剧而逐渐深化对中西文化的认知并形成不同时期的主要思想潮流的。

中国人对西方的注意不自鸦片战争始。早在战前的二三十年代，就有王大海撰《海岛逸志》、杨炳南撰《海录》，谈到西方情况，说望远镜“用以御敌，可望敌营中，能周知其虚实，诚鬼工之奇技”，蒸汽船“行驶如飞”，法国“民情淳厚，心计奇巧，所制钟表甲于诸国”等等。但当时人们主要是出于好奇，并非出自本国政治经济政策的需要，更没有想到要学习西方，才去了解、留意西方的。鸦片战败，魏源据林则徐《四洲志》等资料撰成《海国图志》60卷，在《筹海篇》中，他检讨敌胜我败的原因，认为除了清朝本身战守指挥失误外，主要是英国在战船、火炮和养兵练兵之法等三方面优越于中国，首先在军备器物上承认自己不如人，大胆地提出“师夷长技”的政治主张。但无论是魏源还是林则徐，都不曾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怀疑。林则徐遭到清廷那样无理的处置，他的态度却是“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魏源复撰《圣武记》14卷，褒扬清初武功，幻想“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重振大英雄风。然而，林魏“师夷长技”的思想毕竟起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启蒙作用，开始了第一个从器物上承认不如西方文明而有必要舍己从人（师夷）的时期。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六七十年代，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有可能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得出进一步的认识。冯桂芬在1861年著《校邠庐抗议》，说“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他

虽然在器物之外又比较了中西方在人才、地利、君民关系等方面的优劣，但结论仍然是：“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耳”，至于其他方面，则“惟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此无待于夷者也”。基于此，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即“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成为影响甲午战前整整一代中国人的主导思想，形成中国近代第一个大的政治思想潮流。在这一思潮指导下进行的洋务活动，一方面是西方物质文明（船炮、机器、民用工业品等）和自然科学技术理论的进入，是驻外使臣和留学生的派出，这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有了更广泛更直接的接触和了解；另一方面，是单纯在器物上舍己从人的洋务活动并没有使中国真正强盛起来，促使人们对中西文化必须作进一步的比较与认知。1877年，马建忠通过自己在法国巴黎一年多学习生活的观察，得到对西方文明的新认识。他给李鸿章写信说：“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①他通过实地考察，认识到西方所以富强不仅在于船坚炮利和养兵练兵等“长技”，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护商会”和“得民心”，即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1892年郑观应进一步发展这种认识。他在所著《盛世危言》自序中说：中国向西方学习得很多，洋务活动搞了几十年，但有几人能深明西方文明的本末呢？“（观应）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

①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第31页。

其流。……为文官者必出自仕学院，为武官者必出自武学堂，各擅其长，各副其实，与我国之取士之法不同。……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通，果足恃哉？”马建忠、郑观应都是李鸿章培养起来的洋务外交家、企业家。他们的上述言论当然主要不是对洋务活动的反对，只是指出其严重的不足；也没有从根本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怀疑，但他们都看到和承认西方不仅在器物方面有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地方，而且在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也有优越于中国的地方，这显然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应验了郑观应纵令“铁舰成行”也不足恃的预言。战后中西冲突的加剧和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推动着先进的中国人在前人已有的认识上继续前进，跨入对中西文化的物心结合部分进行比较与认知，从制度上承认不如人而勇于革新的新时期。代表着这一时期的思想潮流的，是以维新变法为内容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和以三民主义为内容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这种革新思潮的共同点不仅在于承认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优于中国，而且进而探求这种制度赖以形成和确立的思想理论基础。严复认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之所以优于中国，是以所谓“公例通理”作为科学依据的；“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拙，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公例通理违行故耳。”^①于是，由严复开其端，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等踵其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哲学、法律、社会、伦理等著作、学说被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初步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思考中国问题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中的温和派或右翼，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希望清朝当权者能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或俄国彼得变政，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缓慢地确立起君主立宪的西方民主制度，以适应和推动新生

①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外交报》第9期。

产力的发展，达到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目的。他们中的激进派或左翼，如孙中山等人，则主张武力推翻清朝帝制，建立民主立宪的共和国。辛亥革命一举推倒清朝，当然首先是革命派的功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甲午战后兴起的上述改良和革命两种思想潮流交相推动的结果，因为没有戊戌维新改良的失败，便不会有革命思潮的澎湃，没有在康梁思想影响下的立宪派势力的合作，革命派便不可能取得迅速结束清王朝统治的目标。

但辛亥革命是失败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除了不称皇帝称总统，不称帝国称民国，中国近代社会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现实迫使人们继续思考与探求：中国学西方已经很不少，坚船利炮引进了，科学技术引进了，民主共和制度也引进了，为什么仍然不能变得象西方国家或者日本那样富足强大？这就推动着先进中国人对中西文化的核心部分即文化心理状态进行更深层更全面的比较与认知。早在上两个时期，中国人就敏感到中西方文化心理的歧异点，如左宗棠说过：“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术为重，义理为轻。”^①后来严复更作过一系列的对比，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等等，他认为：“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②当然，中西文化深层的心理状态的差异远比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表层的肤色的不同要隐蔽和复杂得多，因而要认识它也困难得多。左宗棠、严复那两代人虽然注意到中西文化心理的差异，但他们的比较和认识却是肤浅的。能够对这种差异做出深刻全面比较和认识的，是这一时期的

① 《左宗棠全集》卷十八，《机器拟购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

②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外交报》第9期。

李大钊。他撰《东西文化之根本异点》一文，指出中西文化心理的根本不同是一个主静，一个主动，并具体罗列如下各点：

“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等等。通过这类比较与认知，在一方面得出的结论，诚如梁启超所说，是认识到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去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标志着这一觉悟的，是以民主与科学为两面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是“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和改造国民性的讨论，其目的在于养成全体国民的民主、科学的群体意识；更有甚者，宣传反传统，提倡所谓全盘西化，认为不如此便不能造成真正的共和国民，不能有共和革命的胜利与巩固。这种比较在另一方面的结果，是使有些人感觉中国到底不是外国，中国人到底不是西洋人，学了西方不但不能救中国，反生出无穷内乱和割据军阀，似乎应验了康梁派所谓革命必至内乱、内乱必生割据、割据必遭瓜分的预见，于是倡导回头去从中国传统中找出路，发掘“国粹”，使辛亥以前已经出现的国粹主义更趋活跃。因此，反传统的全盘西化和回归传统的国粹主义，就成为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的主要思想潮流，也是中国由近代步入现代的思想状况。

三、时代性与民族性：

近代思想家的困惑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如果不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

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资本主义到处用自己的面貌来塑造整个世界。毫无疑问，对于被侵略扩张，被塑造的古老国家而言，诚如马克思所说，这是一个“放血”的过程，因此，被压迫、被奴役的国家和民族奋起反抗殖民扩张是天经地义的。但另一方面，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又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定的历史进步因素。文化既是一个历史学的范畴，又是一个社会学的范畴，因而任何类型的文化都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这两种属性。所谓时代性是指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如奴隶制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等等，它可以有相对而言的先进与落后之分，比较其价值的不同。文化的这种时代性主要表现在物的层面以及物心结合的层面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活跃与比较活跃的因素。民族性是指文化的地域性和传承性，如欧洲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等等，它是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赖以存在的依据，并主要表现在文化的心理层面上，一般无可区分轩轻，尤其是属于民族情感、性格、气质这些最深层、核心的部分，更无从区分其优拙。由于文化的民族性是在千百年中无数代人相传相因、积淀融凝而形成的，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和传承性，因此，任何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强力进入的外来文化，即使是优越于本民族的外来文化，都有一种本能的排拒力。人们常说传统与习惯是一种惰性因素，主要是指这种不随机性而言，它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不活跃的部分。但是文化的民族性又总是在一定社会的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而也应当是发展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它最终要受到时代性的制约。如何既保存民族性，又适应时代性，使旧时代的民族文化发展成为新时代的民族文化，这是令近代思想家最感困惑的难题。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古老国家，这悠长的文化传统培养了中国人可贵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力以及不堪忍受异族压迫的反抗精神。当近代中国被强制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